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

——兼评柯纳伊的一本书

ECONOMIC REFORM: A REVIEW OF A BOOK BY KORNAI

安·布热斯基

I

和其它东欧国家一样，二次大战后匈牙利采用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工业国有化，农业大部分集体化。建立了由上而下的一整套机构：计划局、部、委等等来领导经济。包罗一切的、以物资平衡为中心的中央计划系统掌管分配资源。颁布了具体的生产指标连同原材料、劳力、技术革新、投资方案及其它种种经济定额。计划基本上是按物资类别来制定的，也用价值计算，并且有各种财务指标，例如：成本、收益、利润、补助等等。这些指标把物资分配和财务（如国家预算、银行的货币与信贷）联系起来。在总的计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理论上，这样一个有着一套相互配合的物资和财政指标的国家计划，应当能够指导匈牙利经济的一切活动。

只要还有剩余的劳力，还存在未加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那么通过挖掘这些潜力，匈牙利就能很快地增加生产。以1950年为100，官方统计表明马克思主义概念下的国民收入在1955年达136。（据西方经济学家欧内斯特（Maurice Ernest）的估计，按西方标准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更高，达141）。但即使在

这一阶段，匈牙利经济的缺陷也已开始显现。工业品的品种和质量不能令人满意，效率不高，轻率的浪费十分普遍，在消费市场和工业供应系统中都有长期的物质短缺。匈牙利经济的这些困难，部分是由于强制性的工业化，过分强调重工业，影响了传统的出口部门——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种从苏联抄来的半自给自足（semi autarkic）的经济政策完全不适合匈牙利这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小国（现在仅有1,000万人口，面积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上述这些不良现象，显然是由于五十年代片面强调增长的政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缺陷还有更基本的特征。它们大体上是系统性的，取决于中央计划和管理上结构和功能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五十年代中，这一问题开始引起相当的重视。东欧，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指出，实际的经济实践与书本上所描述的社会主义计划和管理的理想情况相差很远。

II

特别有说服力的分析是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柯纳伊作

出的。1957年他发表了《经济管理中的过度中央集权——依据匈牙利轻工业的经验所作的批评分析》。虽然作者强调自己限于一个国家一个领域的有限经验，但他的分析和结论无疑有更普遍的意义。

柯纳伊的出发点是“对经济机制（mechanism of the economy）的具体描述和分析”。他把机制视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包括“经济管理行政体系使用的方法（如计划系统、货币、信贷、工资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他的调查研究特别讨论了“在基层单位、企业、中层管理机构和工业领导部门各级机构之间在计划和管理过程之中的相互关系”。

在柯纳伊及其它许多东欧经济学家看来，过分地依赖“计划指令”即行政命令会使功能失调。发布那么多命令去规定企业的每一个活动，一定会脱离实际，过分僵硬，并且常常是无效的。再加上按完成生产总量发给奖金这样一套物质刺激制度，行政命令不仅无法实施，反而常常适得其反。企业的行为取决于从社会得到的利益，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制定计划时，隐瞒生产能力，夸大投资需要的情况经常发生。而在执行过程中，诸如不当的产品组合，不合标准的质量，

原料和燃料的浪费，挪用资金和超支的错误，更是相当普遍的。“计划指令”如指标、配额等等的累进性扩大，不仅很难消除这些弊病，甚至使这些症状变得更糟。

对企业受财经责任的制约——所谓“用福林（匈牙利货币）控制”的方法——也没起多大作用。在已有的计划指令，特别是生产指标的统治下，企业经营的实际财务情况，实际上不可能得到重视。况且，即使真正重视了财经指标，企业活动的财经指标本身，尤其是利润和成本，在经济学上也是含义不清的。由于畸型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五十年代的匈牙利和其它东欧国家大大削弱了货币与经济之间的正常关系。这导致特殊的恶性循环。硬性和任意地制定价格（这本身是过度中央集权的副产品）抵销了任何把决策权力下放到企业一级的有意义的努力。

另外一个与短缺有关的恶性循环，也强化了已经过度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无疑地产生于取得极高工业增长率的愿望，其办法是强制积累和发展生产资料。由于这种强制性的政策，匈牙利的工业化便极端困难了。结果消费和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有增无已。对国家来说，总的不平衡现象表现在持久的、普遍的匮乏。柯纳伊正确地强调说：“物质匮乏极大地加强了走向中央集权的趋向。”因此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

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还有另一个恶性循环使过度的中央集权长期存在，构成一个因——果——因的回路。不难看出，在匈牙利实行的这种中央计划和管理，要求大大增加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柯纳伊指出1948—1954年间支薪职员增加到几乎2倍）。行政机构的臃肿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官僚化，“过度的中央集权、指令的扩张、对地区领导管理独立性的限制加强了官僚化的趋势”。当然，官僚主义有许多有害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官僚主义作风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严重威胁。最重要的还是官僚机构趋向于在现有体制中

发展既得利益，因而变成一种力图保留过度中央集权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改革。官僚主义和过度中央集权互相强化（不仅在匈牙利，也在其它东欧国家），必然会导致政治危机（东德发生于1953年，匈牙利于1956年，波兰于1956、1970、1976、1980—1981年，捷克于1968年）。

柯纳伊一再强调：“过度中央集权是前后一致、相互统一的机制（coherent unified mechanism），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有它特殊的趋势和规律，……这些经济机制隐藏在自身深刻的矛盾之中。”虽然也引进了改革，如改组机构，制定新的规章制度、奖金制度，以及新指标等以改善匈牙利的经济，但过去这些零碎和表面的改革，无力去除过度中央集权的那些副产品，（其它东欧国家，尤其波兰和捷克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类似）。他的结论是：“1953—1954年以来，计划和用行政管理经济的方法的缺点越来越清楚。过度的中央集权和伴随着它的官僚主义压制了企业工人和地方干部进行管理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必须进行更彻底的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柯纳伊提出彻底考察经济所需的大前提是：“生产的社会过程显然不能看作类似于单一目标的巨人活动，……我们应当把企业看作基础细胞……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需要在企业发展速度和满足国民经济利益的程度之间建立间接的联系。……个人的收入应该取决于他们的企业在整体上达到的水平和成果，同时顾及他们个人的成就。……需要刺激企业人员，特别是领导人，竭力为企业的利益有效地工作，然后归根结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简而言之，必须把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它们之间尽可能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要沿着这一途径重新安排经济，就要求在计划方法上，货币与财经制度上，尤其在制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作不少改变。”柯纳伊改革的许多设想都是从承认两个最

重要的事实出发的：即“经济中的许多因素和过程很复杂，不可能用指令来控制；中央也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的细节进行正确的衡量。”

从这一透视出发，过去匈牙利进行的各种经济改革是不够的。柯纳伊认为特别在1954年所搞的合理化措施是失败的。“虽然花了极大的精力，但基本目标并未达到。”互相割裂的修修补补没有用处，“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体制改革”。他强调各种工业需要不同的对待，必须考虑产品的特点和重要性带来的特殊要求，专业化与集约化的程度，以及消费者的数量与类型。管理钢铁工业或电站不能和管理纺织业的方式相同，“必须停止用同样的行政方法来管理所有的工业。”

各种工业改革方案必须相互配合为总的蓝图。“虽然中央干预在程度上可以有所不同，但所有的工业必须根据统一的基本原则来组织，否则经济管理机构的任务不能实现。没有一套相互配合的原则，中央实施的对所有工业部门都有效的合理政策（如工资、价格和财经政策）便不可能成功。”如果推行一种零敲碎打、互不相关的政策，“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不会对不同工业的特点给以充分的注意。如果在体制的某一部分取消了行政命令，就必须用相应的刺激机制和正确的价格体系来取代。必须有一种实在的经济力量去促进企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实在的经济力量，而放弃发布中央指令，就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并损害经济。”

没有哪一个原则，例如根据利润给予物质刺激的方案，能成为包治百病的仙丹。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与计划（例如投资计划与发展新技术）必须共存，但这种结合必须是细致和适当的，以确保兼容性和有效性。这些周密地考察整个体系的计划管理的思想，要求计划和管理中的各种改革要互相促进的思想，是柯纳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特殊贡献。较早的作者如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提出过社会主义有效经济的抽象模型；卡莱

斯基 (Kaleski) 提出的只是已有体制的个别修正。只有柯纳伊首先尝试搞清实践的需要和经济改革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过度的中央集权》一书一直受到重视, 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 他的观点仍然切中时弊的原因。

III

1957年匈牙利对计划和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 轻工业中强制性的计划指标减少到 4 ~ 6 个; 具体的生产计划和产品的配套都由生产企业和购买企业之间直接订合同来处理, 并依据利润对管理人员及企业雇员发给奖金。柯纳伊赞扬这些改变“一般来讲是有益的”。他认为这些措施与他自己的方案方向一致。这段时期采取的措施是更多利用刺激而不是命令。

1961—1963年间进一步改组合并企业, 把企业数目减少了一半。这些行动的意图是调整经济内部的交流渠道, 把超负荷的纵向渠道(部——局——企业)转向发展横向渠道(企业——企业), 但是计划管理的机构仍然只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1957年及后来的企业改组效果不大, 是由于受到习惯势力、贪图省事和既得利益的影响, 重新恢复中央集权的趋势始终存在(例如波兰在1957~1959年间的改革很快逆转, 清楚地表明了存在这一趋势的危险)。匈牙利领导人决心阻止开倒车, 他们着手于更彻底的改革。

六十年代, 现有计划管理体制的矛盾更加尖锐。匈牙利达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来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保留的余地几乎穷尽。从1950—1963年, 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增加了一倍多, 而由于1956年的大批流亡, 人口只增长了8%。劳力的缺乏使匈牙利不可能把增加人力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源泉。同时, 大量吸收新资本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匈牙利产值中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1955~1959年间的24.2%上升到1960~1963年间的27.2%, 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考虑, 不能再增加了。这些新的限制对匈牙利

经济增长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 固定资产对产值的增长比率在1951~1955年为4.7, 1956~1960年升到5.8, 1961~1964年为6.0。显然, 匈牙利已进入向深度发展的时期。进一步增加生产必须主要依靠更好地利用资源。这就迫使匈牙利这样一个小国提高生产技术的效率和充分利用外贸机会。

面对这些新的任务, 彻底考察经济体制的需要变得非常迫切了。改革方案的起草授权给一组经济学家和11个专家工作组。这一次的方案是综合性的, 考虑了方法上的问题, 拟定了一组比较统一的方案来处理经济各方面的问题。改革草案在1965年11月党的全体会议上通过, 1966年5月官方正式宣布为党的指导方针。由于这些步骤, 著名的“新经济体制”达到了实行阶段。

这次的改革不仅考虑周密, 而且准备工作非常彻底。先提出各种初步的措施, 特别是进行了价格的调整, 然后才使改革的所有措施从1968年1月1日起同时生效。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产生预期的效果。正如改革的一个主要设计师伊斯特凡·弗列斯(Istvan Friss)所警告的: 以为“改革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生效”是不现实的。

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在经济中把必要的国家干预经济与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为此, 中央部门仍须控制一些手段。弗列斯教授在1971年出版的《匈牙利经济体制的改革》(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一书中提出六组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 即“价格政策, ……提高个人收入的政策, ……投资政策, ……信贷政策, ……外贸政策, ……和财经预算政策。”国家计划要说明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战术, 但计划实行的保证主要是通过运用间接的手段而非强制性的指标。赋予企业对日常运行和投资计划的决策自主权。取消了生产指标和投资定额, 恢复了企业决定许多产品价格的权利。制定了四类价格: 自由价格、幅度限价、最高

限价和国家规定的传统固定价格。各个工业部门的安排是不同的, 对1968年各类产品规定的价格种类的百分比如表1所示:

表 1

产品种类	自由价格	幅度限价	最高限价	固定限价
国内原料	28%	2%	40%	30%
工业成品	85%	4%	10%	1%
消费产品	25%	25%	30%	20%

从制定(或限制)某些物价出发, 中央机构就可以确定企业得以运行的财经及货币基础。在缺乏直接的定量控制时, 这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最重要的途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交易多由企业决定, 但中央政府控制兑换率、关税、和贸易的其它货币——财务指标。为了确保正常的贸易和投资, 基本原料和燃料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一致。对收入, 特别是工资和薪金仍然进行总体性控制(当然不象以前那样控制得太紧), 尽可能放宽物质刺激的实行范围。主要的投资计划, 特别是新厂的设置, 仍由中央掌握。此外, 企业也可从利润中提取一定资金, 银行则根据对项目价值的审定发放广泛的贷款。

在引入新经济体制以来的13年间, 独创的匈牙利体制经历了无数的变化, 有的很小, 有的却是非常根本的改变: 企业的自治权在某些领域扩大了, 在另一些领域则缩小了; 产品种类的定价方法从这一类改为那一类; 实行了新的财经手段: 改变了奖金制度等等。许多措施用以对付通货膨胀, 另一些则旨在平衡过分的收入不均。尽管在七十年代初, 曾经有过重新集权——严格控制价格、工资和投资, 一方面由于要控制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由于油价暴涨。即使如此, 仍然没有动摇对改革的基本立场。

要细说匈牙利经济体系的特点和历数它的演变, 虽然很有价值, 这里我们无法做到。总而言之, 在评价这些改革的整体和效果时, 人们不能不同意经济学家们的结

· 下转40页 ·

后备？在什么时候应该开始认真地考虑用机械控制法代替流体控制法？这便是代替的目标，也是路线的转向。

只有作了这样详细的分析并对这些问题都有了解答以后，我们才能谈到如何可以最快最省地把工程做好，即运筹学的问题。否则，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运筹学就无法施展。

另一个例子

我们再以煮茶为例，来说明这里提出的种种问题。

煮茶之前，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要煮多少茶？给多少人喝？这些人喝茶的目的是什么（解渴还是品尝）？这就是输出。需要的茶叶、水、火、茶具等等，就是输入，这些我们都有吗？

然后查看我们煮茶的经验。这个问题本来属于图5中“太容易，缺乏挑战性”的那一类，一般可以尽管放心去做。但是，如果请来了一些精于品茶的朋友，那么，就可能出现图5中那种“积累很多，但不实在”的情况。这与工程中的高精密度要求的情况相似。

再看第二要素。我们要买多少茶叶？茶具是不是合适？够不够用？接着再考虑第三要素，检查一下冒

险率。假定我们的茶叶品种买错了或是变质了，怎么办？估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在什么时候需要检查茶叶，以便决定是否到邻居家去借，到哪个邻居家去借等等？这些便是后备的问题。最后还得想到，假若不慎把茶杯打破或打翻了怎么办？要有充分准备去应付这些情况。

煮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凭常识就会有个大略的判断；但是，庞大复杂的作业是由许多互相关联的因子构成的，涉及的因子太多，需要逐一列出加以比较与筹划。当然可以依靠计算机，但主要的还是我们本身要有系统管理的知识和经验。

结 语

本文只是尝试总结在大的工程计划项目中，如何筹划和采用系统管理的一些经验，着眼点在于把这种大型项目的管理要素化，求得各个因子的冒险率与相互关联，以便提高全部作业的成功率与效果。这种考虑办法可以命名为筹划学。全盘的筹划完备后，再以运筹学的方法求得最优的作业程序来提高效率。筹划学与运筹学同时并用，就形成了完善的系统管理学。

· 上接第23页 ·

表 2

论。正如盖博·瑞维兹（Gabor Revesz）在1975年出版的《东欧新经济体制》（The New Economic System of Eastern Europe）一书中指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体制的成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及其相对于旧体制的优越性。”柯纳伊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经济的两难困境——经济效率和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矛盾》（The Dilemmas of a Socialist Economy: The Hungary Experience）中谈到：“改革产生了明确的结果。在改革以来的10年间，生产以5%~6%的速度健康而稳定地增长。虽然已充分就业，劳力仍然不足，……生产的增长主要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实际工资有规律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显著改善，种类大大增加。所有这些成果发生在其它许多国家的经济深受衰退和通货膨胀之苦的时期，因而特别显著。”如果人们考虑到西欧的衰退对匈牙利的出口市场十分不利，则匈牙利的成就更令人印象深刻。

匈牙利的成功看来在于彻底考

国家	匈牙利	苏 联	捷 克	东 德
国民收入（产值）	163	157	152	152

察它的经济体制，并用各种方法来改进她的实践，当然仍有问题存在。柯纳伊在1980年有篇文章说：“不存在纯粹和完美的和谐社会，每个现实体制都建立在对互相矛盾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实际协调的基础上。”其中分析匈牙利新经济体制的经验时，他发现在冷酷的效率逻辑和社会主义的某些伦理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即使如此，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基于两者平衡的改革仍然是有益的。

引进新经济体制无疑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道路不只一条。确实，用国民收入计算，匈牙利总的成绩与其它经互会国家（COMECON）相比是非常不错的（取1970年为100，表2是1979年的官方统计资料）。

经济改革后的国民总收入增长很多，1961~1970年每年增加5.4%，1971~1975年6.7%。由于

外贸不景气，世界市场衰退，1976~1980年只有3.2%。但即使如此，在非常困难的1970~1980年间仍平均达到5%。从工业劳动生产率来看，改革的效果更加显著：1961~1970年每年增长4.2%，1971~1975年每年增长6.2%，在最困难的1976~1979年仍保持每年5.5%。从任何一方面看，这都是很好的结果。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如果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对象匈牙利这样的小国，已经证明肯定是不适用的，那么，对于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肯定需要做更深远的改革。

· 名言录 ·

所谓天才，那是假话，艰苦的工作才是实在的。

——爱迪生